

東亞文明研究叢書 65

東西朱子學的同調與異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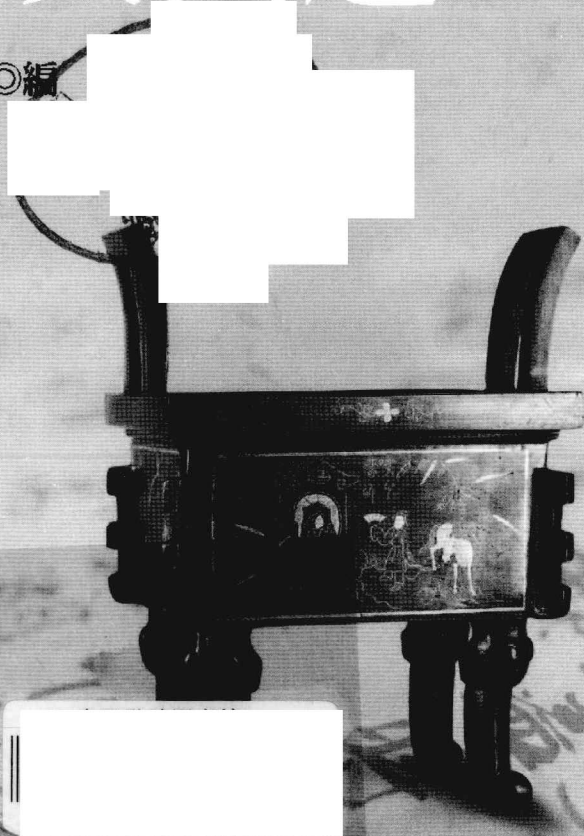
黃俊傑、林維杰◎編



東亞文明研究叢書 65

東西朱子學的同調與異趣

黃俊傑、林維杰◎編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東亞朱子學的同調與異趣 / 黃俊傑、林維杰編.

--初版二刷--臺北市：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 2008〔民 97〕

448 面；15 * 21 公分. (東亞文明研究叢書；65)

含名詞索引及人名索引

ISBN: 978-986-00-6829-0 (精裝)

1. (宋)朱熹 - 學術思想 - 論文,講詞等

2. 理學 - 東亞 - 論文,講詞等

125.507

95019896

統一編號 1009502745

東亞文明研究叢書 65

東亞朱子學的同調與異趣

編 者：黃俊傑、林維杰

策 劃 者：國立臺灣大學人文社會高等研究院

「東亞經典與文化」研究計畫 (<http://www.eastasia.ntu.edu.tw>)

出 版 者：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

發 行 人：李嗣涔

發 行 所：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 (<http://www.press.ntu.edu.tw>)

法律顧問：賴文智律師

展 售 處：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

10617 臺北市羅斯福路四段 1 號

電話：02-23659286 傳真：02-23636905

E-mail：ntuprs@ntu.edu.tw

責任編輯：呂政倚

出版時間：2008 年 12 月初版二刷

定 價：新臺幣 600 元整

GPN: 1009502745

ISBN: 978-986-00-6829-0 (精裝)

著作權所有・翻印必究

序

「東亞儒學」是最近十餘年來許多國內外學界朋友深感興趣的研究領域。這個新學術領域的開拓，固然是有心於拓展儒學研究的新視野，並發掘新的研究議題，但更重要的是從過去「國家中心主義」的儒學研究中掙脫出來，既用心於儒學的普世價值，又著眼於儒家思想與東亞各地文化條件的互動關係。這樣視野下的「東亞儒學」，並不是一套僵硬不變並受到國家機器所制約的意識型態，而是東亞歷史巨流發展過程中與時而俱進，因地而損益，並充滿健動精神的思想潮流。所謂「東亞儒學」正是內在於東亞各地儒者苦心孤詣的思考與爭辯之中而自然形成的思想，並不是抽離於東亞各地之具體而特殊的社會、政治、經濟與文化脈絡之上的一套教條。

在東亞儒學的發展過程中，朱熹（晦庵，1130-1200）無疑是最具關鍵性的思想家。朱子之學對漢唐舊學與北宋諸老先生學說而言是融舊鑄新，對此後七百餘年的東亞思想界則是開宗立範。朱子不僅撰寫《四書章句集註》，自成一家之言，以《四書》取代《五經》之地位；而且遍註群經，成為東亞儒學之典範。近七百年來東亞各地儒者可以闡釋朱子，可以批判朱子，但不能繞過朱子。從思想史角度來看，如果說「東亞朱子學」是東亞儒學最重要的組成部份，亦不為過。

但是，盱衡當代漢語學術界有關朱子學的研究論著，仍以中國朱子學為多，涉及日韓等地的研究較少，「東亞朱子學」是一個值得大力推動的研究領域。2005年9月初，朱氏宗親文教基金會董事長朱茂男先生，透過本校前校長孫震教授介

紹以及朱宏源教授安排與我見面，談到共同努力推動朱子學研究的願景，我和關心朱子學研究的朋友都非常興奮，於是，我們共同決定在 2006 年 2 月 10-11 日，在臺大校友會館舉辦「東亞朱子學的同調與異趣國際學術研討會」，希望拓展朱子學研究的東亞視野。

這項研討會從籌備到舉辦，正值我們研究計畫新舊交迭的空檔期，臺大新成立的人文社會高等研究院，以及我們在研究院之下籌備的「東亞經典與文化」研究計畫，都尚未正式啟動，所以，研討會所需經費都由朱氏宗親文教基金會資助，我非常感謝也是臺大校友的朱董事長對朱子學研究的支持。我也要在此感謝臺大李嗣涇校長、孫震前校長、包宗和副校長兼高研院院長、朱氏宗親會世界總會朱祥南會長、華東師大出版社社長朱杰人教授在研討會開幕式的致詞鼓勵。我也特別感謝包括臺灣在內世界各地的朱氏宗親，以及研究儒學與朱子學的同行學者，他們在兩天會議期間的熱情參與，是這次研討會順利成功的重要基礎。另外，我想特別向中央研究院朱宏源教授表示敬意與謝意，他熱心居中聯絡，對於研討會的成功舉辦貢獻極大。呂政倚和王又仕兩位先生負責編輯與校對工作，在此亦一併致謝。這部書當然還有很多不足之處，我希望這部書為「東亞朱子學」的研究踏出穩健的一步，奠定未來「東亞朱子學」研究的基礎。

黃俊傑

2006 年 8 月 24 日
於臺北・臺灣大學

導 言

黃俊傑^{*}、林維杰^{**}

一

《東亞朱子學的同調與異趣》這部書所收錄的論文，都曾在 2006 年 2 月 10-11 日由臺灣大學人文社會高等研究院・東亞經典與文化研究計畫與朱氏宗親文教基金會合辦的同名的國際研討會上發表，經審查及作者修訂後收入本書。在本書付梓之前，我們想就「東亞朱子學」研究的初衷，以及本書內容略加說明，以就教於讀者。

所謂「東亞朱子學」是「東亞儒學」相關論述與研究中重要的一環。從東亞儒學的發展來看，朱熹（晦庵，1130-1200）之學涵蓋了中國、日本、韓國、越南、臺灣等區域。在這個區域當中，相關的儒學拓展、傳承與研究呈現出兩個層次的特質：第一個層次是儒學由中國經由韓國向日本的傳播過程中，有著共同關切的典籍（例如《論》、《孟》）與議題（例如「五十而知天命」、「四端七情」、「民貴君輕」等），而對議題的發揮程度與內容則彼此不同。從發展的角度來看，儒學價值理念在「同心圓」式的逐層展開時，呈現相當的類似性；

* 臺灣大學歷史學系特聘教授，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合聘研究員

** 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助研究員

從結構的角度來看，各國朱子學思想內容在類似性中展現其殊異性，也是「理一分殊」之具體而微的表現。但是經典與議題的同源性和類似性，不能強制規範各區域的分殊表現，因而這裡便涉及到第二層次的「去中心化」現象。就各區域文化發展的多元以及民族或政治之自覺而言，日韓儒者雅不願將中國儒學視為其唯一中心，而中國儒者也不能一廂情願地將日韓儒學看作其附庸或邊陲。「中心—邊陲」的論述很難解釋這類文化與思想的發展軌跡，即以希臘和基督教文明的發展為例，西歐與美洲大陸日後的發展，已取代這兩種文明起源地的重要位置而成為新中心；而佛教在東亞與南亞的特殊發展，亦早與印度佛教分道揚鑣，並在後者衰亡之後成為新的思想與信仰的重鎮。

朱子學在中日韓地區的發展，也與上述狀況若合符節。舉例言之，朱子針對《孟子·公孫丑上》及《禮記·禮運篇》兩段文字所涵蘊的四端（惻隱、羞惡、辭讓、是非）與七情（喜、怒、哀、懼、愛、惡、欲）而發揮曰：「四端是理之發，七情是氣之發。」十六世紀的韓儒李退溪（1501-1571）與奇高峰（1527-1572），即根據朱子之說而論辯「四端七情」，李退溪主張「四端」與「七情」為異質，而奇高峰則認為兩者屬於同質。朝鮮儒者不僅延續了這項議題的同調，並由兩造之爭論而把這項邊緣內容轉變為核心議題，更突顯中韓朱子學的異趣。再如十六、七世紀的日本朱子學開創人物藤原惺窩（1561-1619）及其後學林羅山（1583-1657），同樣將儒學與神道結合，並致力於儒學與幕府統治的調解，這就不只是朱子學同一基調之發皇，更是朱子學異地發聲的「在地化」。

從哲學詮釋學的立場而言，任何學說與議題論述的合法性，並不在其起源，而是在不同情境或區域中的詮解。換言之，中日韓儒學的曲折遞演並不是一套由中心到邊陲的發展，反而更像由不同民族文化的歷史性來證成其真正的生命。

在二十一世紀全球化時代的今天，文化思維的多元性與自主性，使得我們更能深刻瞭解東亞朱子學發展史中的各種曲折表現。臺灣學界對朱子學研究甚為重視，有關朱子學的研討會始於十二年前（1993）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與中華文化復興總會所舉辦的「國際朱子學會議」，議題廣泛，涵蓋了經學、哲學、宗教、教育、政治、史學、文學、藝術等方面，唯獨東亞其他地區的朱子學研究僅有三篇，而且研究對象皆為韓國儒者；¹中研院研討會之後，相關學者仍延續這方面的研究，2000年朱子逝世八百週年時，國家圖書館漢學研究中心舉辦「朱子學與東亞文明研討會」，會後出版《朱子學的展開》²共二卷，第二卷即為〈東亞篇〉，由楊儒賓主編，共編輯論述朱子學與武夷文化、閩臺文化關係，以及朱

1 尹絲淳：〈韓國性理學與天命思想〉、宋錫球：〈朱子的人心道心說與退溪的人心道心說的比較研究〉以及楊祖漢：〈李栗谷對朱子哲學的詮釋〉，收入鍾彩鈞主編：《國際朱子學會議論文集》（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籌備處，1993年），共2冊，見下冊，頁1403-1457。若再加上崔根德的〈《朱子家禮》在韓國之受容與展開〉（上冊，頁235-248），則為四文。大陸學界於1990年（朱子誕辰860週年），曾舉辦「紀念朱熹誕辰860週年國際學術會議」，會中亦有三篇關於韓國儒學的文章可資參考，分別是董金裕：〈韓國的朱子學〉，蔡茂松：〈朱子學在朝鮮的傳播與影響〉以及高令印：〈論朝鮮朱子學家李退溪的人生哲學〉，均收入武夷山朱熹研究中心編：《朱子學新論：紀念朱熹誕辰860週年國際學術會議論文集（1130-1990）》（上海：三聯書店，1991年），頁617-659。

2 《朱子學的展開》（臺北：漢學研究中心，2002年），兩冊。

子學在日本之論文 11 篇，為朱子學的研究開啟新的視野。

誠如錢穆（賓四，1895-1990）所說：「自有朱子，而儒學益臻光昌。自有朱子，而儒學幾成獨尊。〔……〕尊孔崇孔乃朱子以後中國學術上一大趨嚮；而述朱闡朱，則尚是中國學術上一大爭議。」³錢先生之說甚具卓識，朱子學不僅是公元十三世紀以後中國儒學的主流，也是東亞儒學史的重要典範。只有在東亞思想史的廣袤視野中，我們才能比較全面地掌握朱子學作為東亞儒學公分母的地位與意義。中日韓各國儒者環繞著朱子學所展開的闡朱或批朱的思想發展，使我們看到東亞朱子學的同調與異趣，這是我們編輯這部書的著眼點。

二

現在，我們對全書各篇論文的要旨略加介紹，以供讀者之參考。

本書第一部份「中國篇」共收錄四篇論文，第一篇論文作者鍾彩鈞探討朱子的《易》學研究。《易經》在中國經典中向居首出之地位，熊十力（1885-1968）以「易海」一詞推尊《易經》思想之浩瀚無垠，西方漢學界對《易經》研究及翻譯一向極感興趣。自二十世紀衛禮賢（Richard Wilhelm, 1873-1930）譯《易經》為德文開始，⁴《易經》吸引許多漢

3 錢穆：《朱子新學案（一）》，收入《錢賓四全集》（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98年），第11冊，頁3。

4 Richard Wilhelm, *I Ging : Das Buch der Wandlungen erstes und zweites*

學家的興趣。⁵朱子的《易學啟蒙》亦深獲西方漢學界之重視，⁶並已有英譯本問世。⁷張立文在 1982 年夏威夷的朱子學會議中，就有論文探討朱子的《易》學思想。⁸《易學啟蒙》是朱子關於《周易》的重要著作，共有〈本圖書〉、〈原卦畫〉、〈明蓍策〉、〈考變占〉四篇。前兩篇說明《周易》出於天地自然之數，奠定了代表宋《易》特色的圖書與先後天之學的基礎，

Buch (Düsseldorf, Köln: Eugen Diederichs Verlag, 1924); Richard Wilhelm tr., rendered into English by Cary F. Baynes, *The I Ching or Book of Change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7).

- 5 Arthur Waley (1889-1966), "The Book of Changes," *Bulletin of The Museum of Far Eastern Antiquities*, vol. 5 (1933), pp. 121-142; K. Shchutskii, *Researches on the I Ching*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9), pp. 181-195; Richard John Lynn, tr., *The Classic of Changes: A New Translation of the I Ching as Interpreted by Wang Bi*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4); Edward L. Shaughnessy, tr., *I Ching: The Classic of Changes* (New York: Ballantine Books, 1996).
- 6 Kidder Smith, Jr., Peter K. Bol, Joseph A. Adler, and Don J. Wyatt, *Sung Dynasty Uses of the I Ching*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0); Joseph A. Adler, *Divination and Philosophy: Chu Hsi's Understanding of the I-ching* (Ph. 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at Santa Barbara, 1984).
- 7 Chu Hsi, *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the Classic of Change (I-hsüeh ch'i-meng)*, tr. by Joseph A. Adler (Provo, Utah: Global Scholarly Publications, 2002).
- 8 Liwen Chang, "An Analysis of Chu Hsi's System of Thought of I," in Wing-tsit Chan ed., *Chu Hsi and Neo-Confucianism*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86), pp. 292-311. 其他學者的相關著作可參見林麗真：〈朱熹論易「象」與易「理」〉，收入《國際朱子學會議論文集》，上冊，頁 153-181；劉述先：〈由朱熹易說檢討其思想之特質、影響與局限〉，《朱子學刊》，總 1 輯（1989 年），頁 100-121；李學勤：〈孔子朱子論易異同〉，《朱子學刊》，總 2 輯（1990 年），頁 20-29；王葆玟：〈從王弼周易天演論看朱熹易數之學的淵源〉，《朱子學刊》，總 4 輯（1991 年），頁 75-87。

後二篇則為朱子「《易》為卜筮之書」的主張提供操作方法。李光地（1642-1718）是清初朱學領袖，晚年奉康熙皇帝（在位於 1661-1722）旨意編纂《御纂周易折中》，其中有論及朱子《易學啟蒙》的部分，包括卷十九〈啟蒙上〉、卷二十〈啟蒙下〉以及卷二十一〈啟蒙附論〉。前兩卷是李光地的集注工作，後一卷中的《易》圖則是康熙皇帝結合《易》學和歐西數學的作品，李光地並配合解說這些圖象而成圖說。鍾彩鈞這篇論文研究的是《御纂周易折中》的上述三卷以及涉及朱子《易學啟蒙》的前兩篇。這篇論文提出以下幾個重要看法：

第一，鍾彩鈞主張朱子將河圖、洛書納入《易》學，並引入「二氣五行」的觀念，用意在以天地自然之數作為卦畫之數的來源。

第二，鍾彩鈞指出：朱子與宋元儒以五行解圖書為要，李光地則偏重在「陰陽消長」而捨棄五行生剋，不僅為了符合《易·繫辭大傳》的原文（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天數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天數二十有五，地數三十。凡天地之數五十有五，此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也），更為強調三才中「人」的位置，亦即更偏於人事（人極之參贊）。

第三，鍾彩鈞認為，康熙皇帝在《易》學中導入數學而成圖象，李光地則將之與傳統《易》學結合以成圖說。數學是純形式的科學，並不包含倫理意義，但在李光地的解說下，再度成為傳統倫理道德的支柱。換言之，倫理目的仍是第一，數學的引入正所以輔佐證成了倫理。然而數學與傳統《易》學背後的思考方式不同，數學的引入不能為傳統思想帶來突

破，也因此不能生根，這才是值得注意的事。

除了《易學啟蒙》之外，朱子對文學經典也造詣極深。當代學界對朱子的《詩經》學研究成果較多，⁹對朱子的《楚辭》研究較少注意。本書第二篇論文是陳昭瑛所撰，探討的是朱子之《楚辭》研究及其與儒家美學傳統之關係。陳昭瑛在本文中首先指出朱子在臨終之前三日，仍在修改《楚辭》中的一段，與慶元黨禁的背景有關，但陳昭瑛主要仍是從儒家美學傳統以及朱子理學思想脈絡中，研究朱子的《楚辭集注》等相關著作。陳昭瑛指出，朱子認為《楚辭》是中國文學史上僅次於《詩經》的經典，這項看法與劉勰（465?-532?）《文心雕龍·辨騷》的看法一致。但是，劉勰特別重視《楚辭》與《詩經》的互補性，對《楚辭》更高的文學性、藝術性推崇不已，強調《楚辭》取鎔「經意」，又以其驚采絕豔之「偉辭」超越了「經意」。儒家美學傳統對《楚辭》的理解在朱子的《楚辭》研究中反呈現式微之勢，陳昭瑛認為這到底是由於理學的影響或是朱子政治生涯的影響，是未來值得再研究的問題。

朱子經典詮釋事業的重要哲學基礎之一就是體用論。¹⁰

-
- 9 Richard John Lynn, "Chu Hsi as Literary Theorist and Critic," in Wing-tsit Chan ed., *Chu Hsi and New-Confucianism*, pp. 337-354; 林慶彰：〈朱子對傳統經說的態度——以朱子《詩經》著述為例〉，收入《國際朱子學會議論文集》，上冊，頁183-234；陳昭瑛：〈朱熹的《詩集傳》與儒家的文學社會學〉，收入陳昭瑛：《儒家美學與經典詮釋》（臺北：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05年）；柳存仁：〈《毛詩傳箋》、《正義》和朱熹《詩集傳》〉、朱杰人：〈朱子《詩傳綱領》研究〉、林慶彰：〈朱子《詩集傳·二南》的教化觀〉等三文，收入鍾彩鈞主編：《朱子學的開展——學術篇》（臺北：漢學研究中心，2002年），頁1-68。
- 10 可參見韋政通：〈體用〉條，收於韋政通主編：《中國哲學辭典》（臺

「體用」概念在宋代之前即有實體用與虛體用的不同用法，到了宋儒手中，其意義跨度又有新的擴展。本書第三篇論文的作者林維杰初步整理了宋儒的體用論述，並在其對比工作中指出：朱子的體用論既有繼承前賢者，也有內容上的轉化與新造。其中包含了倫理學意義，亦有本體論內涵，甚至還有工夫論、語意學等向度。

通過林維杰的研究歸納，朱子的體用論主要包含了三個層面：（1）「本體論」的層面：道體（太極）與主體（心體）固然皆有其體用可言，但太極的體用是隨陰陽的體用而行，心體的體用亦是隨性情的體用而說，所以太極和心體皆只涉及虛說的體用，或是「存有而不活動的體用」，只有陰陽之氣化體用才真正是「即存有即活動」。（2）「倫理學」的層面：原則的遵循與應用是有體有用，這是「即原則即應用」或「即理論即實踐」的表現；但由主體自律的價值來看，外在的原則與應用也可能產生割截狀態而成為「無原則卻有應用之體用」。（3）「工夫論」的層面：由於主體（心、性）層面的割截，以及工夫論須連結認識論（格物致知），故只有氣性主體（心）與修養工夫方面可說「即本體即工夫」，在德性主體（性）與修養工夫方面則是「有本體而無工夫」。

儒學發展至明代，心學大盛，當時仍然高舉朱學旗幟以相抗衡者無復幾人，而其中羅整菴（欽順，1465-1547）尤為特出。研究羅整菴的思想，對於全面了解明代朱學的發展以

北：水牛出版社，1999年），頁813-816；陳榮捷：〈體用〉條，收於韋政通主編：《中國哲學辭典大全》（臺北：水牛出版社，1983年），頁853-856；張永鶯：〈朱熹哲學思想之『方法』及其實際運用〉，收於《國際朱子學會議論文集》，上冊，頁341-369。

及評估朱子學者的造詣，實不可或缺。然而迄今為止，有關羅整菴思想的研究還不算充分。鄭宗義在本書的第四篇論文中，對羅整菴的文字作了一較為融貫的詮釋。

鄭宗義的論文分為三部分：（1）揭示整菴宗朱的態度乃在求對朱子的言論作一致、合理的解釋。依羅整菴的閱讀，朱子的文字仍有「未定于一者」，不能使人無疑，而當中的理氣問題更是「僕之所疑，莫甚於此」。（2）分析羅整菴「理氣為一物」的主張。這部分鄭宗義先考查了此說所提出的哲學思想史背景，再通過義理分疏以見「理氣一物」的五個可能說法。作者藉此判定羅整菴的理氣一物說表現了一種內在一元的傾向。（3）申明從理氣觀到心性論，羅整菴的理氣一物說將面對嚴重的理論困難。但他似乎以為藉著對「理一分殊」的獨特解悟，便能脫出困局。其實羅整菴所謂的解決之道雖然使他能接上朱子的心性論，但卻隱涵一種從原先主張理氣一物之立場的退卻。鄭宗義的這篇論文，可以和本書第九篇鄭仁在與第十篇林月惠兩位的文章相互參照。

三

本書第二部份是「日本篇」，所收兩篇論文都討論日本的朱子學。在漢語學術界，對日本朱子學的研究仍以已故朱謙之（1899-1972）先生的業績最有華路藍縷之功。朱謙之的《日本哲學史》以兩章篇幅介紹日本朱子學者的思想，¹¹並有專

11 朱謙之：《日本哲學史》（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及第2

書全面探討日本朱子學的發展，¹²功不可沒。本書第五篇論文作者子安宣邦（1933-）是日本思想史的前輩學者，著述宏富，¹³並有兩本書譯為中文在海峽兩岸出版。¹⁴

子安宣邦所撰〈朱子學與近代日本的形成〉這篇論文主旨在於說明：近代日本以西歐先進國為典範而建立「洋學式」國家時，其實仍奠基於「漢學」的基礎。沒有「漢學」之基礎，就不會有後來的「洋學」，「漢學」是順著「朱子學」的評價脈絡而鋪陳的。朱子學又可分為狹義和廣義二種。狹義朱子學著重「何謂真正的朱子學？」，但在一個不斷詮釋、迭有新解的觀點下，並非合法的研究途徑。廣義朱子學則從朱子主義（朱子後學）的角度，審視近世日本中朱子學在政治和學術之間的辯證角色。子安所採取的是廣義的朱子學角度。

章，頁 26-63。

- 12 朱謙之：《日本的朱子學》（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 年）。
- 13 專著包括：《宣長と篤胤の世界》（東京：中央公論社，1977 年）、《伊藤仁齋——人倫的世界の思想》（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1982 年）、《「事件」としての徂徠學》（東京：青土社，1990 年；ちくま學藝文庫，2000 年）、《鬼神論——儒家知識人のデイスクール》（東京：福武書店，1992 年）、《本居宣長》（東京：岩波新書，1993 年；岩波現代文庫，2001 年）、《宣長問題とは何か》（東京：青土社，1995 年；ちくま學藝文庫，2000 年）、《近代知のアルケオロジ——國家と戦争と知識人》（東京：岩波書店，1996 年）、《江戸思想史講義》（東京：岩波書店，1998 年）、《方法としての江戸》（東京：ぺりかん社，2000 年）等書。除了專書之外，子安先生也編輯《岩波講座・現代思想》全 16 卷（合編）（東京：岩波書店，1993-1995 年）、《江戸の思想》全 10 卷（責任編輯）（東京：ぺりかん社，1995-1999 年）等書。最近出版的新書則有《「アジア」はどう語られてきたか：近代日本のオリエンタリズム》（東京：藤原書店，2003 年）。
- 14 子安宣邦著、陳瑋芬譯：《東亞儒學——批判與方法》（臺北：臺大出版中心，2004 年）；子安宣邦著、趙京華編譯：《東亞論：日本現代思想批判》（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4 年）。

子安宣邦以福澤諭吉（1835-1901）提倡的文明論（由儒家之「德」轉西洋之「智」），以及福澤接班人丸山真男（1914-1996）對儒家式國體論的批判，作為近世日本嘗試揚棄儒家以躋身歐洲國家的學術意識型態之代表。但子安宣邦以幾個批判朱子學的學者為例，反證即使在這類批判中，實際上也存在著朱子學的架構或影響，如貝原益軒（1630-1714）雖以朱子學批判者而為人所知，但他也將儒學或朱子學重新架構成日本近世社會中的「一般性知識」，這種知識是理解世界的知識，或社會普遍能接近或取得的公共性知識。而百餘年之後與福澤同列明治啟蒙學者的西周（1827-1897），也承襲貝原益軒「一般性知識」中的朱子學精神。他在其「教學」思想中，把「教」中的宗教意涵剔除，再將「教」所剩餘的道德思想（外在治人和內在修己）剔除其內在意涵，轉而演化出「法」的近世國家法治概念。但他批判儒學式的思維和知識體系時，並未真正否定和揚棄它，此不僅見於他由教轉法的思路，在「物理」（外在自然之理）以及「心理」（人類固有之理轉到義務、權利之理）等朱子語言的區分中，也可見到這類既批判又繼承的性格在內。

子安宣邦在結論中指出，這種雙重又似矛盾的性格，正是近世日本朱子學的特徵，以福澤諭吉的術語來說，就是所謂「一身二生」。近代日本希望模仿西洋文明的樣態，然其本質卻是漢文明的，亦即漢學的日本。子安宣邦所分析的近代日本的發展歷程與近代中國張之洞的中學（儒學）為體、西學為用之說，具有類似性，只是日本早了數十年而已。

接著，張崑將在本書第六篇論文中探討德川（1600-1868）

初期所見的兩種排佛之風，其一是「以儒排佛」，如古學派伊藤仁齋（1627-1705）、荻生徂徠（1666-1728）；其二是「援神排佛」，這部分學者或是著重兵學、武士道思想，或是以理學解釋神道。張崑將以德川初期朱子學者林羅山（1583-1657）與山崎闇齋（1618-1682）作為理學神道思維之代表。林羅山強調「理當心地神道」，而山崎闇齋則自創「垂加神道」，兩人雖然都信奉朱子學，卻皆有鮮明的本土神道思想，他們都運用朱子理學來解釋神道，而展現日本朱子學的兩大特色。

首先就理氣言之。關於林羅山與山崎闇齋的思想特徵，阿部吉雄（1905-）曾將德川初期的朱子學者區分為「主氣派」與「主理派」，並以林羅山為前者，以山崎闇齋為後者。¹⁵張崑將認為，朱子思想中的理氣是不離不雜，單以理或氣皆無法真正描述林羅山與山崎闇齋，因而按其特徵區分為「以氣言理」（林羅山）與「以理言氣」（山崎闇齋）。林羅山強調理之上有一主宰的天或帝（以此通向神道），而天、帝乃是「一元氣」所出，是就形上說「元氣之神」；又以為天、帝、性、心一也，故是「理氣一元論」。山崎闇齋則不滿意此一元論，因為他認為朱子實是區分形上、形下的「理氣二元論」；山崎闇齋又主張「神也者，理之乘氣而出入者」，神由理出，是由形下說氣。又，從理氣一元的角度來看，林羅山傾向於朱子的「不離」；而從理氣二元的立場觀之，山崎闇齋切近於朱子的「不雜」。

其次就神道言之。林羅山反對神佛一體的神佛習合，提

15 阿部吉雄：《日本朱子學と朝鮮》（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1975年），頁521-533。